

傅柒生 著

軍
史

古田

古田會議紀實



JUNHUNGUTIANYIJIISHI

古田會議永承光輝

如歌學記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 魂

★★★ 古田会议纪实 ★★★

傅柒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魂:古田会议纪实/傅柒生著.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033-1673-X
I. 军… II. 傅…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630 号

书名:军魂:古田会议纪实

作 者:傅柒生
责任编辑:丁晓平
装帧设计: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jfwyph@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96 千字
印 张:13.875
插 页:4
印 数:1 - 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73-X/I·1336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题记

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摘自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目 录

題 记	(1)
第一章 沐血云霄上井冈	(1)
第一节 文家市决策	(2)
第二节 朱毛会师	(20)
第三节 八月失败	(42)
第二章 红旗飞跃过汀江	(59)
第四节 围魏救赵	(60)
第五节 长岭寨大捷	(82)
第三章 塞廓江天万里霜	(105)
第六节 “革命者来”	(106)
第七节 暴动风云	(122)
第八节 三克龙岩	(137)
第四章 群英舌战龙岩城	(161)
第九节 是非孰定	(162)
第十节 “七大”之争	(181)
第五章 毛委员披荆斩棘	(199)
第十一节 高阁流芳	(200)
第十二节 冲破危难	(214)

第六章 朱军长单骑荷重	(233)
第十三节 游击闽中	(234)
第十四节 东江失利	(248)
第七章 陈毅秘行上海滩	(263)
第十五节 煮酒论英雄	(264)
第十六节 “九月来信”.....	(277)
第八章 珠联璧合汀州城	(287)
第十七节 汀江的呼唤	(288)
第十八节 新泉整训	(302)
第九章 圣地古田铸军魂	(317)
第十九节 松荫明灯	(318)
第二十节 古田传真	(332)
第二十一节 光辉篇章	(354)
第十章 风展红旗美如画	(369)
第二十二节 协成名篇	(370)
第二十三节 铁军神威	(390)
第二十四节 光芒永放	(409)
主要参考书目、资料	(427)
后记	(433)

第一章

浴血云霄上井冈

第一节 文家市决策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天还没有放亮，跃动的曙光压抑在天际，浓浓的黑幕笼罩着大地。毛泽东披衣踱出住房，两手叉在腰间，眼望深邃遥远的东方，口中吟哦着数天前所作的一首诗。这首题为《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满怀激情——尽管毛泽东此时身处之境并不乐观。返观历史，毛泽东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甚至逆境中往往表现出天生的乐观和豁达！伟人的大气！

毛泽东的思绪随着《西江月》的旋律回到了那风雨如磐的艰辛探索的岁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的领

导班子，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人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瞿秋白取代了早于1927年7月12日就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的陈独秀，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最高领导的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这个人不习惯住高楼大厦，而更习惯于地方工作，所以我要向你和中央请假，请求到地方去，还请你高抬贵手。”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地方工作——更准确地说是农村或山区工作的才能确实非同一般，前人所不能比拟，亦让同辈人望尘莫及。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湖南秋收起义准备事宜。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方可。”

派哪一位“得力同志”合适？与此极为相似的是，两年后，党中央也要求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赴中央，那时，毛泽东自己没去，陈毅成了“得力同志”赴上海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现在，罗明纳兹认为毛泽东是“得力同志”，所以，他指名道姓地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于是，如心所愿，毛泽东有幸成为了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去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受命改组湖南省委。毛泽东与彭公达一起由武汉到了长沙，会见了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交换了思想。8月16日，由彭公达主持对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由彭公达任新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1927年9月9日，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等人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

秋收起义之际，成立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军的旗帜上绣着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这面旗帜是由何长工设计的。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共计5000余人。

第一团是主力，由卢德铭任团长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八七”会议会址

部警备团以及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组成。驻修水，团长由钟文璋兼任，团副范树德(后改为韩壮剑)。

第二团由安源矿警队和醴陵农民自卫军组成。驻安源，团长王兴亚，党代表蔡以忱(一说为张明山)。

第三团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驻铜鼓，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星元(潘心源)，由徐麒代理。

第四团由流散于湘赣边的原黔军夏斗寅残部改编而成。团长邱国轩(后叛变)。

革命军的成立，是让毛泽东心悦的一件大事。因为，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的血的教训面前认识到了手中握有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还因此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命题，而被人戴上了一顶高帽子——“枪杆子主义”。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直率地陈述了自己关于建立革命武装的全新见解：“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

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而只是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的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18日，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要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部队，跟随已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开赴广东，争取革命的胜利。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而毛泽东则站起来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依我之见，马代表的主张不妥，甚至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广东是革命的重要策源地，革命势力发展迅猛，人人皆向而往之。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不应只看到广东一个地方，我们湖南也很重要，据我调查了解，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只是武装。现正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给中央起草了一个计划，叫《湘南暴动大纲》，已经在常委会上通过了，我在大纲中主张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进而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退一步讲，纵然我们因此失败了，也不用去广东，而应去上山。”毛泽东提出了两条具体意见：“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二个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后，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声称：“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太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却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建议，其实在他心里，这还是有所保留的。只是为了避免过分张扬而刺激党内一

些同志的神经，引起他们的反对，他才有所保留。即使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人的反对。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研究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计划时，就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上夺取政权”思想，批评秋收暴动计划“偏重于军事，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毛泽东坚持己见，他与中央据理力争，以书信的形式辩解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解放后，毛泽东谈起这段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时，显然心存芥蒂：“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跑出个政权来。”

毛泽东坚持走实事求是的真理路线，从具体实际出发，终于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熊熊烈火。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特别是在混乱的状态下，中央也实在有些无能为力加以强制阻拦。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在江西省修水县城宣布起义后，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进军。

可是，工农革命军出师不利。第一团、第四团在向平江县城进军途中，邱国轩的第四团倒戈，使得全师主力的第一团腹背受敌，攻打平江受挫，损失较大。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的第二团和以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第三团虽然攻克醴陵县城，但不支强敌反攻，被迫撤退，向长沙进攻的暴动计划自然如泡影一般破灭了。

而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更为惊险的是他的一次死里逃生。9月9日当天，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一起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凭着他的机智而侥幸脱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以轻松的语气向斯诺详细讲述过这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 200 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 7 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个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 2 个铜板了。

后来有人挖掘出毛泽东此段经历的细节:当时毛泽东一边走着,一边和颜悦色地同押送他的几个士兵谈着话,他说他是安源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购买夏布,到铜鼓去购买茶油。并用右手在口袋里故意动了一下,搅得铜板和银元铿锵响,金钱的响声使团丁两眼闪过一道不易觉察的亮光。当团丁拿着毛泽东给他们的银元互相敲击,听着银元发出的清脆声音时,毛泽东悄悄跑了,躲进了一口池塘边的草丛中……

想到这里,站在朝露寒风中的毛泽东微微打了一个冷战,也为自己当初头脑发热而有些后悔。

8月20日,毛泽东就在长沙的郊外代表湖南省委起草了致中央函,此时的他仍然雄心勃勃: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 1917，但以前总以为这是 1905 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应，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当然，其时的毛泽东还不是党内的“领袖同志”；瞿秋白才是“领袖同志”，毛泽东不是神，自然更谈不上已经走上神坛。所以，他在“八七”会议上表现得很天真很虔诚，他对于领袖的朴素感情一开始表白得很坚决：“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补充说，“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可是，现在看来，“领袖同志的意见”也不一定全对呀——或许这也是一条真理。毛泽东为自己的感悟而高兴。经过斗争的洗礼和实践的考验，毛泽东形成了坚持真理的脾气，每当他认定自己是对的时候，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都要坚持，不管别人反对如何激烈。连毛泽东素以为意见是对的“领袖同志”瞿秋白也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性格特点，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所以瞿秋白以赞扬的口吻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还是按原目的向长沙？不行。”毛泽东猛地吸了手卷“大炮筒”的最后两口，然后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使劲踩到泥地中，自言自语，“对，得开个会，明确方向，统一认识。”

曙光喷薄而出，毛泽东迎着朝阳站立，如同一尊雕像，魁梧伟岸。

9月 19 日晚，文家市的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普通教室，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工农革命军向何处去？

第一师参谋何长工打土豪时搞到一盏汽灯，这回正好派上大用场。炽热的灯光把会场照得雪亮，如同白昼，也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照亮！

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只有 9 个人：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

“进攻长沙！”师长余洒度坚决地说。起义部队失利，很多人依然热

情高涨，认为省委9月8日下达的会攻长沙的命令是要绝对执行的，其实这些人依然是头脑发着热。

毛泽东是会议的主持人，站在讲台上，扫视了一下四周，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依我看，我们不能再强攻长沙，而且强攻长沙必败！”毛泽东出言不凡，在座者顿时鸦雀无声。“为什么？理由也很简单，长沙城内有9000多守敌，我们寡不敌众。我们不能把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革命本钱一家伙全输光了，所以我们应该保存自己实力，避敌锋芒。”

毛泽东话音刚落，师长余洒度跳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本人以为还是要进攻长沙，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这次暴动为什么失利，主要是兵力分散了，各自为战，怎能不败？还垮了整整一个第二团。但是现在我们合兵一处，就可以直取浏阳，攻下长沙。”

苏先骏团长一听师长如此坚决自信，精神为之一振，附和道：“余师长高见，我同意合兵取浏阳攻长沙，这同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是合拍的。”

“我想还是老毛的意见可供参考。”卢德铭总指挥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高明指挥家，他想了想，表态说，“余师长所说看似合理，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合兵以后，表面上力量大了，我们自己清楚两团都是失利之师，一团在金坪辎重全丢了，三团在东门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如果以我伤残疲惫之师，攻强大有备之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盲目冒进，素为兵家所大忌啊。”

“照你这么说，丢下长沙不打，我们不就要逃跑当逃兵了？”余洒度以嘲讽的语气挖苦说，“难道受了一点儿失利挫折，就变得胆小怕事，就退却不革命了吗？”

“不！”余贲民副师长老成持重，脸色黝黑，他站出来反唇相讥他的余姓本家，“难道我们的教训还不深刻吗？难道非要把仅存的一点儿革命老本拼光了才甘愿吗？”

争论激烈，毛泽东静听着，点燃了一根自己卷的喇叭状的香烟，猛吸了几口，吐出一团浓烟。烟雾在他面前缭绕，未等烟散，毛泽东开始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他说：“刚才有人坚持会攻长沙，我认为断乎不可，刚才卢总指挥和贲民同志讲得很好，我同意。”

“依你高见，我要请问诸位，不打长沙，我们的出路何在？”余洒度

说。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让现在的努力革命不中断？”苏先骏也直问毛泽东。

毛泽东不急不慢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他继续说：“在安源的张家湾军事会议上，王兴亚团长曾介绍说江西井冈山是个好去处，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到实地考察过，加上王兴亚自己跑了，去井冈山就只好待以后再说吧。”

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的脑海里就时隐时现着井冈山的模糊轮廓，直到后来成为真实的巍巍形象。

“那怎么办？”

“我主张暂时南下湘南一带，寻机上山。具体来说，就是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向萍乡方向退却。”

“名为退却，其实那是逃跑。”余洒度一本正经地说。

“这不能简单地说成逃跑，我们是要革命到底，只是形式要变化。”毛泽东解释。

的确，毛泽东的文家市决策是以退为进，看似后退，实为前进，而且是高瞻远瞩，突飞猛进！

“退却与逃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行！”苏先骏依然坚持要遵守上级命令，并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

余洒度也装出很强硬的态势，提出如果不按上级命令攻打长沙，他就不干了。说罢，丢下枪，转身而去，苏先骏等一些人见状起身跟着走了。卢德铭想拦住制止他们，毛泽东做了一个摆手的姿势，一边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依我看，我们队伍中要走的人可以提出来，每人给他发一点儿路费回家吧。”

很多人不解，议论纷纷。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卢德铭琢磨着毛泽东的讲话，好一阵工夫，他才想通，觉得确有其道理，便出面明确支持毛泽东。

卢德铭，四川人，19岁那年，他慕名千里迢迢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不料考期已过。于是，卢德铭径直找到孙中山先生办公室要求面试，孙中山先生当面问询了几个问题，卢德铭的机智回答让孙中山十分

满意，破例同意招收卢德铭，卢德铭成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在军校中，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任连长，随军北伐，冲锋陷阵，过关斩将，屡建奇功，提升为营长、团参谋长、团长。1927年9月9日，在江西修水宣布起义，受任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毫无疑问，卢德铭是毛泽东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位得力爱将，若不是早年牺牲，卢德铭一定可以与毛泽东共经风雨，共创伟业。

卢德铭虽然年方20出头，却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听他这么肯定地支持毛泽东，也都不言语了。

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信心十足，兴致勃勃地站起来又发表见解：“我们向萍乡方向退却后，还应该再退到可以屏护自己的大山里去，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就是个好去处。”

“那你不是要叫我们去当山大王？”

“说山大王也可以，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山大王，而又有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虽说山大王是带封建性的，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古代社会不能消灭封建的山大王，难道就能消灭我们这个革命的山大王？”

记得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取消后的善后问题。刚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才10天——6月24日，为了尽快恢复湖南的强有力的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就奉调回来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9人：陈独秀（仲甫）、李维汉（罗迈）、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彭述之、张国焘（特立）。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革命武装在斗争逆境中可以暂时上山以保存实力的意见，历史文献还有幸印记着历史的对白：

仲甫：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或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但要保存着与农会的关系以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每个招兵示出即应与农会接洽，因各军政治部我们都有人。这样我们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不然我们只是空叫农民武装化。

毛：省农协二策略：1. 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 此